

## 第六章 結論

中國人的時間概念，是將時間與宇宙間之神秘思維，結合並貫徹至干支符號系統中，使之蘊含天地與生剋意義，並從中推衍各式相互配合之規矩，使之泛用。如行之有年的「擇日行為」，或透過人之初生時辰的干支八字，以預卜此人一生命運富貴貧賤、祿命窮達，便以臻吉避凶、順命行事。諸事種種，均為中國時間觀念裡特殊的文化表現，據此反觀各類大行民間之曆書，無論《通書》或《農民曆》，上面所載之二十四節氣、朔、望、上下弦與日出日沒時間，附有年、月神方位、每日吉凶神煞及用事宜忌，均是對時間賦予主觀與寓含生活面向之索需，其所意謂的不惟是對生活重大事件之記錄/作息表，更被視為是社稷安排秩序、組織事件的框架。從天地人三方對應之思維裡，中國人強調與四時合拍之心緒，一來基於務農生涯照臨，二來多攙雜對天地神祇之尊崇與畏敬。然而，儘管如是，必再次強調者，時間雖看似無處不在、無所不主宰，但在中國日常生活中，真正對時間之感知、意識，卻相對薄弱，與其說時間充斥在人們周圍，不惟說是神邃/神祇之力量對人之作用益乎強大，以致人們必需透過各式擇日行為，以消滅生命中可能遇到的神阻，以求「權變」。以是，對廣大的中國人來說，時間觀念體系於其生命中最大的作用，不在範定日常節奏，惟與相關之吉凶系統有所連結。以清代來說，通書因允許販售，竟引發龐大商機的爭奪戰，可知將時間視為吉凶意涵之體系，直至有清一朝仍興盛不墜。

反觀西方的時間觀，在其歷史開展之脈源下，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——資本主義——理性辯證——科學技術所貫串的龐雜體制，成功地取代神學方面不容質疑的神聖特質，「時間」對人類具無可逆性，迄至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以降，製鐘技術因社會群眾的需要，具長足發展，十九世紀隨懷錶的普及，時間朝「個人化」方向開揚，伴隨鐘錶而來的「鐘點時間」以及時間紀律，亦隨計時儀器之泛化而內化至個別、個人生活中，成為日常中最具指標性之作用，是近世馴化人性最有效之利器，定時、有節、追求速效為人們企求生活模式。自此，時間不再是自然律動的象徵，在可資計算之時間平面裡，時間以貨幣形式展現姿態，勞動時間成為衡量報償之計數單位，量化的時間具商品價值，可進行買賣、商議，時間被賦予與金錢等值之作用，時間如影隨形地蘊藏於社會各處，透過層層體制支配所有人，展現自身權力。

在西方勢力竭力向東拓展的史程中，中西兩方時間觀念之會同，出現在十九

世紀中葉的上海租界。繼鴉片戰爭後建立起之外國租界，是鑲嵌在東方世界中的一塊飛地。租界中的生活方式、生產方式、市政風貌、政治制度、意識型態，均與傳統中國社會迥然不同，形成巨大、截然之文化反差。租界的存在意義，正如熊月之所言：

租界本身就具有西方文化綜合載體的意義。租界產生以後，它所負載的西方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相互衝撞、互相滲透，產生了強烈廣泛的文化效應，刺激著中國文化的迅速發展，其中以社會思想的變遷最為顯著。<sup>1</sup>

租界內各方不同的文化，創立一多層次的生活結構，自 1853-55 年的小刀會之亂，衝破原本「華洋分居」局面，租界內不惟充滿避難而來的華人，形成事實上的「華洋雜處」，華民從傳統社會進入一事事、處處按西方人生活習慣和對城市理解而建設起來之領域，首必面臨一次心緒與態度上之重大調整、配合。

中國民眾對新式時間之領會，即是通過西人強制推行下的城市管理例則次第建立。城市規範條例面面俱到，以西人慣用的鐘點計時嚴格標定民眾必遵循之細則，違反者輕則罰款，重則處以枷號、監禁，嚴究不宥。與此同時，自 1860 年代，每逢星期一與星期五，黃浦江上英國戰艦以十二點整鳴砲示意，不惟為上海及上海郊區提供確切的時間基準，更提供人們、店家調整對時之便。所行一切，均為警示民眾知時、守時之必要與重要。天長日久，條條法則成為民眾自覺反射舉動，新式時間亦從中內化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。

此外，由西方引進之鐘錶、高矗公共空間的大自鳴鐘，及以七天為時間週期的時曆，影響所及大致一年，小至分秒必較之計時法則，無處不昭示新式時間概念之存在，尤其租界生活對星期六與星期日之看重，進而逐步接納，使人們將生活劃為工作、休息與娛樂各屬有節、編排有序，一來扭轉中國人民向來過著「山中無甲子，歲寒不知年」之緩慢步調，令其體驗現代都市匆忙守節之韻律生活，二來則進一步鼓動滬地新式娛樂行業之發達，開啟新式消費模式，令一種新的生活漸於上海生根、落實。

不惟如此，自上海甫開埠以降，新式的海關制度、輪船航輸均以「週」與「時」表記，各種由西人經營之機構：如工廠、西式書院、交通體制亦以新式時間為遵，鐘點計時化作一式式規章、章程展其高超之效能與便捷，看在亟欲振興中國傾頹國勢之有識者眼中，自然成為必加以仿效、襲用之對象。在自強運動裡各式新式企業、學校之積極推行下，原本屬於外來強權的新式時間，竟陸續成為華土接踵接受、讚揚之時間圭臬：由官方著辦之工業，採以新式計時為計值標的，用以排序工人上下工時段，金錢化與鐘點化成為中國勞動場域中的顯著代表；新式學校

<sup>1</sup> 見熊月之：《上海租界與上海社會思想變遷》，收於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：《上海研究論叢》（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1989）第 2 輯，頁 124。

體系改以鐘點時間作為法式師生作息的統一單位，所有課程、活動均在規律節度的前提下進行，後因成果顯著，進於二十世紀初期，由朝廷出面納鐘點時間為正式準繩，編入中國學制章則，使鐘點時間成為中國統一的計時用法。新式時間所帶的新局面，及與傳統計時制度最大的差異在於，鐘點時間透過準確的報時系統，以及各式法令、規矩，處處要求民眾之舉措合於「標準化」，改變中國人向來予人懶散、對時間不加看重、無節度之陋習，馴化其向西方國家一樣，事事強調準時、合節，追求速效的生活價值。

此外，受到新科技的影響，上海租界引入各式先進的電氣設備、築路方法、電報，改變城市內外的交通及通訊速率。以煤氣與電力之使用來說，其打破自然之限制，使白天延伸至夜晚，為城市、工作延展新的時空。正如馬克思所言：「生產越是仰賴交換價值，乃至於仰賴交換本身，對流通成本來說——通訊與運輸的工具——就會讓交換的外在條件顯得越重要。資本一方面必須致力於拆除所有空間障礙，並且征服全球市場，另一方面則必須致力以時間來廢除空間」<sup>2</sup>上海作為新式制度的整合者與先行者，因商業角度與需要，引進電報作為推進市場與金融決策協調，或爭取交通體系如鐵路網絡之敷設，以橫越自然疆域屏障，拓展對外聯繫。面對行車時間縮短的世界，時空關係被急速壓縮，鐵道系統要求人們「準時」搭車，處處提醒紀律與珍攝時間之必要，且因電報與鐵路行進順遂之需要，催化全球建立統一的標準時區。於此前提下，中國若欲與世界交會、溝通，即必須建立與世界時空齊一化之共時標準。這樣的新式時間，事實上帶著相當程度的規訓治理意味，「守時」與「遵時」是現代社會無形之共時網，將人們納入同一標準的網絡中，時鐘/間與現代經驗、生活相互呼應，成一重合疊影。

如果說，新式時間是西方文化統御中國武器之一，則它的確成功地居處上風，並令中國起而效行。另一方面，中國對新式時間之吸納，本身即具有追新趨西之目的意涵，其援引全世界通用之計時方式，一來為將新式時間與生產方式結合，企願打造可迎頭趕上西方富強的效率價值；二來中國政府為跳脫滯後階序，講求溝通無礙，進一步與外界溝通流暢，同步獲得信息，亦漸次發展運輸（如鐵路體制）與電報系統加速時空整合，以達無滯差之時間流。直至民國成立，新政府全面改曆，以格勒哥里曆法（即陽曆）代替行用千年之農曆，其目的乃為求與世界時序同進。同質、虛空之鐘點時間與通用於世界之日曆，向來被社會學家視為整合世界之基本要素，於此基礎上，中國於採用新式時間，以及推行各項破除時空迷障之建設與制度，無論從何角度切入，均極具走入現代的象徵意義。然而，不容忽略的是，正如史華慈（Benjamin I. Schwartz）教授具啟發性的研究所言，「傳

<sup>2</sup> 轉引自 Harvey, David 著，黃煜文譯：《巴黎，現代性之都》（台北：群學出版有限公司，2007）頁 123。（強調處筆者所加）

統」與「現代」兩大畛域向來從不截然對立，此二者非但不是簡單、靜止或具同質性的指涉概念，相反的，傳統本身亦是個不斷演進、變遷的存在，其中含括之思維、質素，萬端複雜且衝突不斷；「現代」亦復如是，其與傳統時時相互磨合、交融，在高舉「現代」的社會裡，亦或多或少地存在與現代精神元素背離的傳統質素。<sup>3</sup>正如在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中，新式時間雖已成為中國強勢行用之時制，然而，傳統的時辰觀與農曆，儘管不再具有主導意義，卻未曾全然消失，它以強韌之生命力，使其適用性變得特定與特殊，在今日仍相當盛行的術數擇日行為裡，以及依節氣作業的農、漁民生活中，農曆與干支制依舊具有深淺不一之影響作用，是新局面與轉化中的舊趨向，交織互動成就今日所存在的時間型態。

雖然如是，但如伯曼(Marshall Berman)於《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——現代性體驗》一書，所言：

今天，全世界的男女們都共享著一種重要的經驗——一種關於時間和空間、自我和他人、生活的各種可能和危險的經驗。我把這種經驗稱作「現代性」。所謂現代性，就是發現我們身處在一種環境之中，這種環境允許我們去歷險，去獲得權力、快樂和成長，去改變我們自己和世界，但與此同時它又威脅要摧毀我們擁有的一切，摧毀我們所知的一切，摧毀我們表現出來的一切。現代的環境和經驗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、階級的和國籍的、宗教的和意識型態的界線，在這個意義上，可以說現代性把全人類都統一到了一起。<sup>4</sup>

伯曼認為「現代性」為新世界帶來前所未有且持續變動之斷裂意義。因現代生活本身就是個「不斷崩潰與更新、鬥爭與衝突、模擬兩可與痛苦的大漩渦」，將所有社會與生活均席捲而至漩渦中。<sup>5</sup>有趣的是：倘若將上述引文裡提及的「環境」一詞以「時間」代換，此論述竟出乎意料地暗合近百年來「時間」所帶來之真實體驗：「新式時間」之到來，毀壞中國過往對時間的模糊感知，「時間」意識之轉換，讓中國以前所未見的眼光體驗、觸摸世界與領略速度，時間與現代性如一體二面，不惟休戚與共，抑且相互抬舉對世界之作用與影響。

<sup>3</sup> Benjamin I. Schwartz, "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?: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," *China and other matters*(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6), pp45-64.

<sup>4</sup> 見(美)馬歇爾·伯曼(Marshall Berman)著，徐大建、張輯譯：《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——現代性體驗》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)，頁15。

<sup>5</sup> 同前注。